

# 沙裡淘金：從胡佛檔案重溫東亞冷戰史

林孝庭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員

囿於二戰後美蘇兩國之間的緊張對峙，兩大國的冷戰對抗幾乎持續了整個 20 世紀的下半葉。冷戰對抗導致美蘇的相互猜疑，憂患加劇以及一系列把這兩大世界級的超級強權引向災難邊緣的國際事件。冷戰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以蘇聯的解體宣告結束；但時至今日，其在當今世界政治舞臺上的政治、經濟、制度、文化方面仍遺留下許多影響。（註1）過去的二十年裡，隨著前蘇聯歷史檔案和材料的涓細流出，及蘇聯前衛星國允許學者從後冷戰時期的視角發表新的論文和觀點的緣故，一個「新」冷戰史——借用史學家約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學術術語——遂應運而生。（註2）

也許為時過早，然確不得不驚歎：一個新的冷戰史確實在亞洲冷戰研究的領域中紮根。幸運的是，隨著過去十年裡胡佛檔案館不斷開放的中國研究新史料，東亞冷戰史的重新解釋，特別是針對蔣介石與在臺灣的國民黨（KMT）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逐漸可行，且有其必要性。亞洲冷戰史研究的目的本是為了探求亞洲在兩個超級大國間錯綜複雜的競爭中的歷史定位；然而，正如胡佛最新開放的檔案材料表明，冷戰期間，縱使某一亞洲國家的內部系統受制於超級大國的利益和決策，其行為仍可能被其國內事務所驅使，如民族主義、獨立性和國家建設。因此，即使亞洲冷戰史仍不可避免的會落入兩大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與自由資本

主義)和兩大政治勢力(美國和蘇聯)對抗結構的窠臼,但其附庸國的情況仍值得更進一步的檢視和反思。

本文試圖通過耙梳胡佛檔案館藏如下館藏,提出東亞冷戰史研究的新見解,這些檔案包括鄧祖謀、王玉麒、王昇、魏景蒙、魏鏞與田朝明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隱藏」的檔案瑰寶相對地鮮為人知、鮮少研究。它們揭露了不為人知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圖景,極可能會大幅改變我們之前對冷戰史的認知。這批檔案材料也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東亞歷史場景,豐富我們對彼時世界上複雜的冷戰政治的理解。

## 隱秘的日本軍事顧問

1949年是中華民國政府最黑暗的一年。在擁有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相比下仍稍占上風的軍事態勢,且政治鬥爭中也略有優勢的情況下,蔣介石在1949年1月下臺。但在他的半引退時期,蔣仍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繼續掌控大部分的權力。譬如,1949年秋,他指示一位軍中親信在東京組織一支「新軍」,成員皆由前日本帝國軍人所組成,讓他們作為一支既可靠且忠誠的生力軍,以投入他的反共大業。(註3)雖然在隨後的幾個月裡,中國大陸情況迅速惡化,「新軍」沒能來得及成軍;但在1950年2月,也就是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的兩個月後,18位日本前軍官自橫濱取道香港

抵達臺灣。這些軍官由富田直亮領導。富田直亮曾在舊日本帝國的陸軍第23軍中擔任參謀長,而他現在起了個中文名「白鴻亮」,組建了「白團」,開始為蔣介石的殘餘部隊策劃軍事教育和訓練計畫;一個軍官訓練團很快的在圓山附近的隱密地點興辦,這些日本軍事顧問開展了非正式的秘密計畫。(註4)

蔣介石確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日本更加瞭解中國所面臨的共黨問題。畢竟中日兩國打了八年的戰爭。這一想法可能促使蔣介石下定決心聘請日本前任軍官來訓練臺灣那些士氣低沉的軍隊。但「白團」也可能是蔣介石用來孤立孫立人的策略;孫立人能力顯著,經常違抗國民黨政府陸軍總司令的命令,並一直受美國人看重。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時,謠言滿天飛:孫立人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將發動政變,取代蔣介石領導「自由中國」(臺灣的代名詞)。(註5)

對於許多美國人而言,白團的存在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不久前蔣介石仍把日本視作不共戴天且最致命的宿敵。1951年春,就在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MAAG)正式在臺北設立後不久,白團的數目已從18個增加到76個,成為美方急需跟蔣介石攤牌解決的問題。(註6)當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白團訓練計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證實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方法不適宜中國,且國民黨政府能在軍事方面從日本學到更多時,華盛

頓方面認為驅逐白團乃勢在必行之舉。(註7)

1952年7月，面對美方強大的壓力，蔣介石命令白團轉入地下。圓山訓練據點被關閉，工作人員被裁減到約30人。但日人的訓練計畫很快以研究軍事理論和實踐的名目在另一個地點恢復。隨著胡佛檔案館新增館藏的日本手稿案卷揭露，蔣介石允許白團繼續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日本軍事顧問經常被邀請參與策劃國民黨反攻大陸的計畫，和其他秘密軍事行動。更令人震驚的是，蔣介石甚至與白團的成員分享極機密的軍事情報，特別是來自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和中央情報局關於臺灣國防的情報、游擊戰、中國東南沿海的突襲行動。(註8)

即使難以置信，重起爐灶後的日本軍事顧問團又悄悄運作了整整十七年，直至1969年初，日本軍事顧問主動要求停止他們的訓練計畫並返回日本為止。據估計，白團在臺灣存在了近二十年；蔣介石手下超過1萬名的中高階軍官皆曾參與訓練計畫。1972年秋，正當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致力於與北京方面外交關係正常化並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時，胡佛檔案館藏鄧祖謀個人檔案卻顯示，白團的成員們曾在維繫臺北與東京之間即將崩潰的政治、軍事和情報合作上，發揮重要的作用。一份致鄧祖謀的聯名信顯示，在東京的臺灣最後一批軍事武官、白團成員們發誓作為一個基於共同反共意識形態的實際溝通管道，以及一個監督田

中首相的對華新政策的壓力團體。(註9)直至1980年代初期，在缺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白團成員在促進蔣經國與日本政界高層人物的友誼方面，仍繼續擔任關鍵的角色。

## 隱秘的德國軍事顧問

1950年6月，韓戰的爆發導致的局勢變遷，致使杜魯門政府重新反思其政策和對臺灣的態度。之後，華盛頓方面派遣第七艦隊介入臺灣海峽局勢的決定，乃是蔣介石和他那一度被遺棄的國民黨追隨者之轉捩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蔣介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來保衛和鞏固反共基地臺灣島。(註10)儘管有表面上堅強的美國臺灣冷戰同盟，但蔣介石仍不時向昔日的二戰宿敵尋求軍事諮詢。1950到1969年間依賴白團成員一事，反應蔣介石內心深處對美國政府的疑慮，以及他反射性的對美方竭力隱瞞其作為的態度。

秘密聘用前日本軍官絕不是冷戰期間美臺聯盟出現裂痕的唯一例證。正如胡佛檔案館藏王玉麟個人檔案所揭露：1960年代初期，在未與華盛頓或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的共同磋商下，蔣介石亦聘雇前德國軍官作為他的「個人顧問」，來訓練、傳授並評估這些裝備美式配備的臺灣軍隊。他的理由既理性又實際；蔣介石擔憂美國人主要依賴物質和武器優勢的戰爭思維可能不適宜他的葛爾小島。正如蔣介石所

見，德國軍隊在以少勝多的策略上顯著成功。（註11）1961年春，蔣介石對西德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局長派來的高階代表萊茵哈德·高倫（Reinhard Gehlen）表達了自己的焦慮，希望能找到一名合適的人選來擔任他的私人軍事顧問。高倫（Reinhard Gehlen）推薦了賽克特（Hans von Seeckt），一位曾在1933到1935年時擔任蔣介石剿共行動的軍事顧問。後來，由於健康原因，賽克特推薦他往昔的戰友，奧斯卡·孟澤爾（Oskar Munzel）繼任職務。（註12）

孟澤爾於1963年11月第一次踏上臺灣土地，並作為蔣介石的特別顧問停留六個月。他是二戰時期在納粹德國國防軍中受到極高評價的少將，二戰後仍在德國聯邦國防軍中統帥所有的實戰部隊，這使他一開始就讓蔣留下深刻的印象。蔣介石特別喜歡跟這位德國將軍討論臺灣在軍事上大大小小的問題。（註13）為了與孟澤爾這位新的德國顧問共事，一個隱蔽的辦公室在臺灣軍事體系和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的監視下謹慎地運行著。在1965到1975年間，孟澤爾和他的兩位繼任者，保羅·喬丹（Paul Jordan）和庫爾特·考夫曼（Kurt Kauffmann）帶了一個24人的非正式德國軍事顧問團來改革臺灣的裝甲部隊，檢視臺灣的軍事訓練，並連繫起臺北和波昂之間的軍事、情報合作管道，和改變蔣介石軍中的階級心態。這個團隊還建立一個特別計畫，促使蔣介石派遣軍

官前往德國軍事學院進修和實習。從1964到1973年間，有25位軍官參加了這個計畫。其中17位被晉升為將軍，隨後幾十年在軍中的重要單位和國安體系裡服務。（註14）

1966年底，美國詹森總統開始高調的談論美國對華政策將可能有所轉變。焦慮的蔣介石因此更加依賴德國軍事顧問團。王玉麟個人檔案提及約在1966年末，一個採用德式操典、裝備和教範的實驗性步兵營曾在孟澤爾的指導下成軍，且很快得到蔣介石的青睞。鑒於額外的軍備和財政開支以及無時無刻的備戰狀態，這支德式訓練的步兵部隊終究引起了美國人的注意。在1969年春的數週內，美國軍事顧問團官員頻繁檢查部隊，疑心叢生，最後還以為蔣介石正在秘密準備反攻大陸。（註15）

與日本白團相類似，德國軍事顧問團一直運作到1970年代中期，恰是臺灣失去聯合國席位和德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後的四年。它於1975年12月被解散，正是蔣介石逝世八個月後。可能當時臺灣的實際掌權人蔣經國認為沒有甚麼重要的理由要繼續聘用德國人。（註16）然而1971到1975年間，當臺灣的國際地位受到災難性打擊並被孤立的情況下，這些顧問團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臺灣與西德的非官方溝通管道作用。（註17）當尼克森政府準備對中共政府展開懷抱時，臺灣是否曾利用這條管道向西德軍隊購買急需的彈藥，甚至包括發展核

武器的敏感設備，值得進一步考證。

## 臺北與莫斯科間的密會

自 1960 年代中期以來，莫斯科和北京方面的分歧日益擴大，雙方皆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增兵。遲至 1968 年末，雙方已在各自邊境屯兵數十萬。1968 年 8 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宣稱根據布里茲涅夫主義中的「有限主權論」，蘇聯軍隊有權介入並防止該國共產政府被推翻，這似乎是給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的嚴重警告。

（註 18）在臺北，蔣介石謹慎觀望中蘇關係進展，預測莫斯科將在侵犯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對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蔣介石因此試圖探索出一條可能的「俄國選項」，並派遣一位會說俄語的內閣成員到墨西哥拜訪當地的蘇聯外交官。1968 年 9 月初，蔣從墨西哥方面得知，蘇聯同樣渴望推翻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且與臺灣合作對克里姆林宮來說，顯然是一個值得認真考量的選項。

（註 19）畢竟美、臺間的同盟關係從未像此時如此糟糕；在此同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亞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在《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專欄上鼓吹華盛頓方面應在下一個聯合國會期，以「兩個中國」的方針來解決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戈德堡的觀點只是加深了蔣介石對於白宮對華立場將有所轉變的疑慮，從而促使臺北決定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儘管蔣介石自 1949 年以

來長年宣稱蘇聯是亞洲地區的萬惡之源。（註 20）

因此 1968 年 10 月，當《倫敦晚星報》駐莫斯科通訊記者（顯然是一名克格勃特工）維克多·路易士（Victor Louis）申請取道東京訪問臺灣的入境簽證時，蔣介石給他大開綠燈。蔣經國的密友魏景蒙（James Wei），成為路易士的聯絡人。據胡佛檔案館藏《魏景蒙日記》透露，路易士的看法是國民黨與蘇聯雙方應探索共同合作推翻毛澤東的方式。（註 21）蔣經國在 10 月 29 日與路易士會面，回應由於美國試圖開展與北京方面的外交關係，絕不允許臺灣反攻大陸，且毛澤東的政權嚴重威脅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生存，這就給予了臺北和莫斯科之間的談判空間。但蔣經國也告訴路易士，蔣介石無法立即且激烈的反轉現行對外關係以與蘇聯交好，因此，未來的雙邊交流將會秘密進行。（註 22）

1969 年春，中蘇關係的惡化導致雙方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Damansky）發生軍事衝突。多年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透露說，珍寶島事件乃是加速尼克森政府重新整合與北京、莫斯科之間的大三角戰略之轉捩點。（註 23）這次衝突也加速了國民黨與蘇聯的秘密談判的步伐。魏景蒙的日記顯示，1969 年 5 月初蔣介石駐西德的秘密特工彙報珍寶島邊境衝突後，蘇聯政治局成員如亞歷山大·謝列平（Alexander Shelepin）和彼得·謝列斯特

(Petro Shelest) 開始提議接近臺灣，以此來圍攻和施壓中國大陸。在政治局的建議下，基本指導方針適時地被制定出來，包括蘇聯和蔣介石應立即秘密締結雙方合作對抗毛澤東的協議，而莫斯科當局也應鼓勵臺灣的國民黨加入中國共產黨內的反毛派系，一待毛澤東的政府被推翻，就立刻建立聯合政府。(註24)

這條情報，無論真偽，都促使蔣氏父子制定了與莫斯科合作的五大要點。其基礎為蔣介石將與中國大陸的反毛同盟合作，並組織一個「後毛澤東時代」的聯合政府，但僅能由國民黨控制聯合政府，不准莫斯科插手(註25)。5月14日，魏景蒙帶著合作條款飛去維也納與維克多·路易士秘密會面。儘管路易士對於蔣介石提出的莫斯科——臺北合作計畫避而不談，但他仍敦促臺北展開與莫斯科交換軍事情報的計畫，並提出蔣希望從蘇聯購買的軍需品列表，作為雙方合作打倒毛澤東的第一步。(註26)

在維也納會面之後的數週內，路易士催促臺北制訂可行的反攻軍事計畫，甚至不排除莫斯科方面會同意讓蔣介石的部隊使用蘇聯的軍事基地。(註27) 1969年8月，蘇聯邊境巡邏隊在哈薩克——新疆邊境發動突襲，雙方爆發一場遭遇戰。當消息傳到臺北後，蔣介石確信全面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的時候到了。在蔣介石看來，破壞中共核設施乃是當務之急，且同時嘉惠臺北和莫斯科。(註28) 然而，當魏景蒙10月初再次前

往羅馬，準備與路易士再一次秘密討論並傳達蔣介石的合作意向時，這個克格勃特工沒有出現。路易士給了魏景蒙一封密電解釋他不在的原因，乃是因為羅馬不是個討論如此高度敏感話題的安全地點。不過，實際的原因可能是莫斯科方面不想在阿列克謝·柯錫金(Alexei Kosygin)和周恩來兩國總理於9月舉辦一場旨在緩和中俄關係的會談的時候節外生枝。(註9)

臺北和莫斯科之間的秘密通信又持續了兩年。1970年10月底，魏景蒙和路易士再次於維也納會面。路易士告訴魏景蒙，蘇聯政治局的內部有嫌隙，以布里茲涅夫為首的鷹派傾向與蔣介石發展緊密的關係，以此作為挫敗毛澤東的一種手段。而柯錫金為首的鴿派則傾向於改善與北京方面的關係，反對與臺灣合作。儘管處在中央政治局的黑暗政治格局中，維克多·路易士仍為臺北提出了合作草案，其說法明確而直接：因為尼克森總統永遠不會同意蔣介石以軍事手段光復大陸的計畫，蘇聯將成為世界上唯一願意幫助蔣介石達成目標的強權。路易士再次要求臺北制定一個可行的反攻計畫，並盡快向莫斯科方面提出其物資、後勤和人員要求。(註30)

在1970年代初期，尼克森政府很明顯的開始繞過臺灣以改善中美關係，蔣介石發現他必須以保留與蘇聯合作的選項為槓桿，來應對不容樂觀的國際形勢。魏景蒙從維也納回來不久，蔣氏父子毅然決定接受路易士

的建議。現在他們同意向莫斯科請求蘇聯製造的武器和軍火，蘇聯派遣顧問團援助和訓練臺灣部隊。作為對蘇聯軍隊援助的報答，蔣介石的部隊將目標瞄準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的中共軍事基地。1970年11月中旬，蔣介石指示魏景蒙通過曼谷的秘密聯絡點傳遞以上資訊給路易士。（註31）

正當蔣介石開始對蘇談判轉趨認真之際，莫斯科方面卻突然失去了興趣。俄國人和中共開始談判解決邊境爭端，並在12月18日簽署了條約，這些事情臺北方面皆一無所知。該條約降低了蘇聯和中共之間的戰爭可能性，使得莫斯科方面不再急切尋求與臺灣的軍事合作，（註32）然而，這項邊境協議並未大幅緩解中蘇兩大共產主義國家的敵對關係。俄國人繼續與臺灣通過魏景蒙和路易士進行秘密對話，他們通過墨西哥市和東京的聯絡管道重啟聯繫。為不顧一切地擴展臺灣在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中的生存能力，蔣氏父子繼續探詢與蘇聯合作的可能性，但與蘇聯的聯繫越來越零星，也不像以前那麼熱絡，因此成效甚微。1972年春，蔣氏父子拒絕了路易士再次訪問臺灣的請求，這場臺、蘇之間的冷戰賽局從而告終。（註33）

## 亞洲格局中的臺灣冷戰

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蘇、中美的緊張關係的大致改善，冷戰情勢遂逐漸趨緩；

因此臺灣的國際地位，隨著國民黨統治的正統性一同滑落谷底。臺灣領導人儘管試圖維持與美國的脆弱盟約，但也基於國家生存的理由必須探索其他外交出路。臺北與莫斯科之間的秘密溝通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導致了1972年春一場短暫的政治動盪。當蔣介石的外交部長回應記者關於尼克森歷史性訪華的問題時，說臺北可能有她自己與莫斯科的「華沙會談」。（註34）儘管蔣經國在這個時刻已實際掌控國事，確定臺灣別無選擇，只能接受美國對大陸的新政策，但他仍堅決走自己的路，試圖減少臺灣對美國的依賴。蔣氏父子意識到，臺灣已丟失在聯合國和其他大部分國際組織的席位，無法避免臺灣外交的崩潰和阻止臺灣的盟友轉承認北京；但他們相信只要「反共」繼續作為東亞的主要意識形態，就能維繫住臺灣的國家安全。臺灣也與這些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鄰國保持軍事和情報的合作，不論有無外交關係。

王昇自1930年代末開始與蔣經國熟識，關係親密。1970年代開始受託承辦臺灣的軍事和情報外交事務。1939年王昇加入國民黨，被送入由蔣經國主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受訓。結訓後，王昇被蔣經國挑中，此後為他工作了五十年，包括照顧蔣經國因婚外情所生的雙胞胎兒子。1950年代，王昇建立了政治作戰學校的前身，作為國民黨軍隊和黨員幹部的精英訓練學校。他在蔣經國所主導軍中政戰體系內，地位僅次

於蔣經國本人，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訓練軍隊的政治幹部，協助蔣氏父子將反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忠誠深植到臺灣軍隊的每一個角落。（註35）

王昇計劃輸出和移植臺灣的政戰體系到南越的作為，讓他成為了冷戰時期亞洲地區著名的「反共大師」。1961年初，為加強南越軍隊的反共意識形態和決心，在南越總統吳廷琰的要求下，王昇帶領7名國民黨官員在西貢開辦一系列的反共政治和心戰培訓計畫。（註36）這計畫隨後擴充為一個正式的軍事顧問團，象徵蔣介石所宣稱之臺越密切合作的反共聯盟的開端。1975年春，西貢即將被北越攻占前，臺灣是世界上唯一仍派駐非正式軍事顧問團協助無望的南越政府抵禦北越的國家。（註37）

1970年3月，在一場推翻施亞努親王的軍事政變之後，龍諾將軍領導的反共政權在柬埔寨成立。蔣介石欣見一個反共政權在印度支那成立，並立即指派王昇擔起建立臺北與金邊關係的重責大任。尼克森政府在努力擴展與北京關係的同時，強烈反對臺北和龍諾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免此舉激起共產主義入侵柬埔寨和煽動東南亞的不結盟政府運動。因此，臺灣軍事代表團不再試圖建立使館，而是直接駐紮在金邊推動雙邊合作。王昇個人檔案顯示，龍諾將軍非常堅決的引進臺灣的政戰體系到他的軍隊中，罔顧老雇主美國人是否贊成。1972年9月，王昇的人馬開始進入柬埔寨，以臺灣政府的預

算為資金，開始進行心理和政戰訓練課程。這項合作很快擴展到其他領域，諸如情報收集、大規模動員、破壞活動、突擊和滲透。（註38）但這些培訓項目對於龍諾將軍政權的衰弱於事無補，這很大程度應歸咎於外部威脅和權力內鬥。王昇最後一次訪問柬埔寨是在1974年12月，見證了當地迅速惡化的軍隊士氣、經濟和國安情況。（註39）1975年4月中，龍諾政權倒臺的前夕，臺灣是最後一個讓其代表團撤離金邊的國家。

1975年春天，印度支那被共產黨攻陷，這促使蔣經國加強臺灣的秘密軍事和情報外交。1975年中期到1980年代早期，王昇秘密訪問東南亞所有的非共產主義國家，包括泰國（1975年、1982年）、印尼（1975年）、菲律賓（1979年）、馬來西亞（1982年）。他通常與最高領導人會面並討論軍事和情報合作。王昇個人檔案顯示，在馬尼拉，總統斐迪南·馬可仕告訴王昇，他將不會允許國際政治影響兩國的密切合作，包括臺灣武器出口到菲律賓、臺灣培訓菲律賓士兵、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情報收集專案。（註40）在吉隆坡，總理馬哈地對王昇說，他希望馬來西亞向臺灣學習反共意識形態和經驗，請求臺灣協助綏靖馬來亞的共黨勢力。其他的馬來西亞軍事首腦則熱誠的向王昇尋求協助，以建立馬來西亞的電戰系統和退輔體系，臺灣在馬來西亞軍事訓練項目發揮諮詢顧問作用。正如馬哈地所言，即使臺北和吉隆坡沒有正式的外交關



係，這些合作也可以實現。（註41）

王昇個人檔案也首次揭開了1980年代早期劉少康辦公室扮演的神秘角色：一個低調的、受國民黨秘書長領導的反共小組。隨著1979年1月中美關係正常化，北京改以非軍事對抗、統戰等和平攻勢吸引臺灣，促使焦慮的蔣經國竭盡所能尋求出路，劉少康辦公室因此應運而生。1979年初王昇成為這個辦公室的首位負責人，他深入研究了大陸形勢及臺灣如何應對大陸。該辦公室本身並沒有指揮權，為臨時的特設機構，需要從其他機構借調人員。（註42）

在相當短暫的時間裡，劉少康辦公室迅速擴充，遠遠超過了原先的任務需求。正如王昇檔案顯示，劉少康辦公室不僅僅處理共產黨的和平攻勢或威脅，而且涵蓋了廣泛的議題，包括僑務、軍事情報、在大陸的間諜和滲透行動、臺灣的教育和意識形態，以及黨、政府、軍事和外交事務。（註43）劉少康辦公室因此轉型成政策諮詢機構，成為一個為蔣經國和國民黨上層領導服務的智囊團。因此，他吸收臺灣最優秀的人才做政策建議。因劉少康辦公室的影響力，它被稱為「國民黨總部的內府」，王昇也成為僅次於蔣經國總統的二號人物。1983年3月，雷根總統邀請王昇參觀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軍事情報處，主流媒體如《新聞週刊》開始將王昇描寫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五個月後即1983年8月，覺得芒刺在背的蔣經國決定外派王昇擔任駐巴拉圭大使。這不僅標誌

著劉少康辦公室的結束，也代表王昇在臺灣政治中的特殊角色已然終結。（註44）

## 雙重發展：民主化和冷戰最後階段的兩岸關係

隨著1979年1月臺北和華盛頓之間外交關係的惡化，反國民黨運動在臺灣再次興起。政治反對派看見斷交風潮損害了執政黨所宣稱的正統性。反對派認為，美國已經拋棄國民黨政府，臺灣是孤立的、弱勢的；且因國民黨聲稱統治整個中國，而處於被移交給北京的危險中。逐漸增強的反對派壓力和斷交風潮最終導致了發生於1979年12月國際人權日的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註45）據美國國務院在臺灣新設立的美國在臺協會之工作人員回憶錄表示，國民黨慫恿反對派發動街頭暴亂，然後遵照戒嚴法實行鎮壓。臺灣傾向獨立的長老教會領導人也捲入了政府的鎮壓和軍事法庭審判。（註46）從1979年起，這個自1949年遷臺以來的威權統治政府最糟糕的一面從此表露無疑。

1980年2月，1979年高雄暴亂中的一名被告：林義雄的家屬在家中被殺害。國民黨聲稱對此一無所知，儘管警方24小時監視林義雄的住宅。1981年7月，一名美籍華人學者、人權倡者陳文成在被警方監視的情況下，死在一棟五層樓的建築物樓下。國民黨政府的某個情報機構分支顯然與此謀殺案脫離不了關係。這些事件的累加，

最終導致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之局勢有所轉變。(註47)胡佛檔案館藏田朝明個人檔案曾提及，黨外民主運動經過約二十年的發展，這些反對派候選人在國民黨主導的選舉中逐漸嶄露頭角，黨外運動最後結合成一個有組織且合作密切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田朝明，一名在日本受教育的醫師，因推動臺灣民主、人權和政治獨立的努力而廣為人知。他是1947年2月國民黨在臺灣血腥鎮壓反政府暴動(二二八事件)的事件目擊者。田朝明因此成為1949年國民黨在臺實行威權統治後的政治異議分子。所以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組建民進黨時，田朝明也成了其中一位創黨元老。(註48)

反國民黨運動日益高漲，國民黨政府對此進行殘酷的鎮壓，包括謀殺。但這也使執政黨國民黨內部出現了深刻反省其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針的聲音；一群年輕的、且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精英們曾經提出類似的政治訴求，試圖說服國民黨轉向而非採取威權暴力的手段。(註49)魏鏞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魏鏞個人檔案現保存於胡佛檔案館，他是土生土長的湖北人，在國共內戰期間移居臺灣。1967年他在美國俄勒岡州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然後像那一代多數在海外留學的臺灣精英一樣，留在美國執教數年。1974年魏鏞成為第一個被授予胡佛研究院國家研究員的非美國公民。受行政院長蔣經國的邀請，魏鏞返臺，次年擔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席，任職十二年。

1980年，可能得到蔣經國的許可或心照不宣的默許，魏鏞提出他的創新理論「多體制國家」和「雙重承認」，為相對於北京來說處境越來越艱難的臺灣尋出路，以打破臺灣的國際孤立現狀。這一觀點不同於「分裂國家」，應該被認可為兩岸統一之前的適當的國際地位表述。(註50)魏的理論引發了廣泛的爭論，影響了在冷戰最後階段的臺灣外交和兩岸政策。多體制國家理論亦可能影響1981年鄧小平更進一步的提出「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的指導原則。(註51)

因此，兩位截然不同，擁有不同生活背景和人生軌跡的人物，皆見證了冷戰最後階段的臺灣內外情勢發展。他們的個人檔案都保存在胡佛檔案館，揭示了臺灣民主化的血淚歷程，以及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從完全的拒絕往來到尋求新可能性的轉變，為之後蔣經國時代和後冷戰時代大規模的兩岸交流奠定了基礎。

## 結語

上述的胡佛檔案館藏個人檔案如何為學術界提供更廣闊的視角？這些珍貴的檔案就像是冷戰史研究的新突破口，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讓歷史學家能夠對既定的冷戰研究框架提出質疑；這些檔案也給研究者們提供證據和機會，去重新思考因冷戰的二元思維而被大幅簡化的亞洲地區，那錯綜複雜且耐

人尋味的政治、軍事局勢，從而自更高層次來觀察複雜的臺美聯盟內情。

從胡佛檔案館藏檔案可看出蔣介石通過聘用日本和德國的軍隊顧問，表明他不願對美國保護者的意志言聽計從的態度；同時我們現在得知，臺灣領導人在尼克森總統訪華的前幾年間，即暗中與所謂的意識形態宿敵蘇聯秘密談判，尋求聯合對抗共產中國的可能性。如今我們亦看見 1970 年代蔣氏父子與臺灣的亞洲鄰居開展了一系列秘密的軍事和情報外交，試圖改善臺灣日益惡化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這些外交方面的努力從不拘泥於雙方是否有正式外交關係。最後，胡佛檔案館的藏檔讓我們得以一瞥臺灣在民主化、政治上的自我認同、以及冷戰最後十年裡兩岸關係解凍的進程。希望這些隱藏至今的歷史檔案能為理解冷戰的東亞歷史，以及延續至今的影響和遺緒，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 【註釋】

1. Carole K. Fink,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13), pp. 1-4.
2.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8.
3. Hsiao-ting Lin, "U.S.-Taiwan Military Diplomacy Revisited: Chiang Kai-shek, *Baituan*, and the 1954 Mutual Defense Pact," *Diplomatic History*, 37:5 (2013), pp. 975-977.
4. Barak Kushner, "Ghost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he 'White Group' (*Baituan*) and Early Post-wa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ast and Present*, Supplement 8 (2013), pp. 139-142.
5. 20 世紀 50 年代初那些試圖推翻蔣介石的神秘政變可參見 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209; Ronald L. McGla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Dean Aches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1993), pp. 104-127.
6.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y for June 27, 1951, Chiang Kai-shek Diaries (Hereafter CKSD),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49.
7. Lin, "U.S.-Taiwan Military Diplomacy Revisited," *Diplomatic History*, pp. 977-978; Kushner, "Ghost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pp. 143-144.
8.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KMT Mainland Affairs Division for the year 1952, April 30, 1953; Statistics on the Nationalist guerrillas on the mainland, May 2, 1953,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Manuscript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96.
9. 參見：Joint letter from members of the former *Baituan* to Deng Zumou, December 1972, Deng Zumou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1; Statement by the Japanese National Assembly towar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72 (n.d.), *ibi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Okamura Yasuji Comrade Association, (n.d.), *ibid*.
10. 有關冷戰時期的美臺同盟，可參見 John W. Garver,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11. 參見 Wang Yue-che, "Chiang Wei-kuo's relations with the German Military Group," (1990), Wang Yue-che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1.

12. Transcript of oral interview with Wang Yue-che, September 5, 2001 (Taipei), Wang Yue-che Papers, Box 2.
13.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ies for November 23, December 30, 1963, and April 1, 1964, CKSD, Box 70.
14. Oskar Munzel, Erfahrungsbericht 1968, Wang Yue-che Papers, Box 1.
15. Wang Yue-che, Review report on the Germ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May 1976, Wang Yue-che Papers, Box 1.
16. Transcript of oral interview with Wang Yue-che, September 5, 2001 (Taipei), Wang Yue-che Papers, Box 2.
17. Wang, Review report on the Germ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May 1976, Wang Yue-che Papers, Box 1.
18. Mingjiang Li, *Mao's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Ideological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35-152.
19.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ies for September 2, 7 and 12, 1968, CKSD, Box 74.
20.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ies for September 14 and 19, 1968, CKSD, Box 74.
21. James Wei diary entries for October 23 and 24, 1968, James Wei Diaries (Hereafter JWD),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12.
22. James Wei diary entry for October 26, 1968, JWD, Box 12.
23.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p.722-724.
24. James Wei diary entry for May 5, 1969, JWD, Box 11.
25. 同上。
26. James Wei diary entry for May 15, 1969, JWD, Box 11.
27. James Wei diary entry for September 20, 1969, JWD, Box 11;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ies for July 23 and 28, 1969, CKSD, Box 75.
28.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y for September 6, 1969, CKSD, Box 75.
29. James Wei diary entry for October 16, 1969, JWD, Box 11;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y for November 25, 1969, CKSD, Box 75.
30. James Wei diary entries for October 30 and 31, 1970, JWD, Box 12.
31. Chiang Kai-shek diary entries for November 8 and 9, 1970, CKSD, Box 76; James Wei diary entry for November 13, 1970, JWD, Box 12.
32. 關於中蘇邊境衝突，參見 Yang Kuis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1:1 (2000), pp. 21-52; Lyle J. Goldstein, "Return to Zhenbao Island: Who Started Shooting and Why It Matter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8 (2001), pp. 985-997.
33. Paul H. Tai, "The Russian Option," *Hoover Digest*, 2010 (3), p. 186;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78.
34. Ralph N.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8-172.
35. Thomas A. Marks,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Wang Sheng and the Kuomintang* (London: Frank Cass, 1998), pp. 37-39, 128-172.
36. 參見The Vietnam Files, Wang She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13.
37. Chen Jian,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Taiwan: Pragmat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02), pp. 168-170.
38. 參見The Visit to Cambodia File (1972), Wang Sheng Papers, Box 14.
39. The Visits to Cambodia and Thailand Files (1975),

- Wang Sheng Papers, Box 14.
40. The Visit to the Philippines File, Wang Sheng Papers, Box 15.
  41. The Visits to Thailand and Malaysia Files, Wang Sheng Papers, Box 16.
  42. Marks,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p. 256-262;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74-375.
  43. Files regarding Chairman Chiang Ching-kuo's instructions, two volumes, Wang Sheng Papers, Box 13.
  44. Marks,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p. 288-289.
  45. John F. Copper,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p. 113-114; Richard C. Bush, *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pp. 76-77.
  46.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22-423.
  47.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p. 95-101.
  48. 參見：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ian Chaoming and his family members in the 1980s, Tian Chaomi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 and 3.
  49. 討論詳情參見 Edwin A. Winckler, "Elit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85," in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New York: M. E. Sharpe, 1988), pp. 151-174.
  50. 參見魏鏞關於多體制國家和雙重承認的著作，可參見 Wei Y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12 and 13.
  51. 更多資訊可參見魏鏞網上資料，[www.yungwei.url.tw](http://www.yungwei.url.tw) 2014年5月7日更新。